

韓國古地圖上所見的中國古地圖的影響

(韓) 李明喜

內容提要：中國與韓國自古以來多有文化交流，地圖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傳統時期中、韓之間的地圖交流，可從兩個方面進行考察：一是文獻記載的地圖交流痕跡，二是現存的古地圖上可見的影響關係。文中選擇既有代表性又在中國較少介紹的韓國古地圖，來探討中國古地圖對韓國古地圖的影響。主要考察對象為朝鮮王朝的天下圖。朝鮮王朝繪製天下圖的方法是在從中國得到的大陸地圖的基礎上，增加朝鮮半島、日本等周圍國家。兩國之間的地圖交流，朝鮮王朝主要是接受的立場，但朝鮮人並沒有單純接受中國的地圖，有時候隨著繪製目的和自己興趣的變化，在地圖上做一些改動。本文主要探討的古地圖問題是：《大明混一圖》與朝鮮本《王洋識輿地圖》的關繫；《廣輿圖》對朝鮮的《天下輿地圖》、《天下大摠一覽之圖》等地圖的影響；《大明一統志》對朝鮮金壽弘的《天下古今大摠便覽圖》等讀史用地圖上的文字和內容部分的影響。

關鍵詞：古地圖 韓國古地圖 中國古地圖 朝鮮王朝 天下圖

一、朝鮮王朝^①以前的影響

自古以來，韓國和中國之間一直有頻繁的文化交流。許多研究已經提到了唐與新羅、宋與高麗之間的文化交流。地圖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現在留下來的中國古地圖大部分是明清時期的。韓國的情況與中國差不多，現在韓國古地圖的絕大部分是朝鮮王朝時代的。因此，通過古地圖實物難以考察 15 世紀之前兩國之間的地圖交流，但有些文獻告訴我們，明清時期以前在韓國已經有中國地圖學的傳入。對此，有兩個很重要的記錄，第一是製圖理論的傳播，第二是地圖實物的流傳^②。

1. 與製圖理論的傳播有關的記錄

《海東金石苑》卷二，“唐新羅朗慧和尚塔碑”中記載著唐太宗把《晉書》賜給新羅武烈^③王的事實。

論曰：麟史不云乎，“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則昔武烈大王為乙絜時，為屠穢貽乞師計，將真德女君命，陞觀昭陵皇帝，面陳“願奉正朔、易服章。”天子嘉許，庭賜華裝，受位特進。一日，召諸番王子宴，大置酒，堆寶華，俾恣滿所欲。上乃杯觴則禮以防亂，繒彩則智以獲多。衆辭出，文皇目送而嘆曰：“國器。”及其行也，以御製並書《溫湯》、《晉祠》二碑暨御撰《晉書》一部賁之。時蓬閣寫

是書裁竟二本，上一錫儲君，一為我賜。復命華資官祖道青門外，則寵之優、禮之厚，設尊官乎智者足亦駭耳目。自茲吾土，一變至於魯，入世之後大師西學而東化，加一變至於道。則莫之與京，捨我誰謂，偉矣哉！^④

此為新羅真德女王二年（648），金春秋（武烈王即位之前）與他的兒子（後來文武王）以外交官的身份去唐，進行了新羅與唐朝之間的軍事同盟交涉。據文，唐太宗厚待他們，並賜了《溫湯》、《晉祠》碑與《晉書》等。

那麼此時《晉書》的新羅流傳為什麼重要？原因在《晉書》的《裴秀傳》中。《晉書·裴秀傳》裏所引用的《禹貢九域地域圖》序文中有著名的“製圖六體”。製圖六體的內容為分率、準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其實裴秀自己也沒有使用過這種確定的稱謂，而是清代學者依據裴秀的製圖理論整理而成型的^⑤。對此六體的意思，學界還沒有定論，不過大家都同意此六體並不是裴秀所創造的，而是他總結此前已有的製圖理念得出的。

“製圖六體”在中國地圖學史上有很大的意義。不過古代韓國人是否也認識到這種理論，現在不能斷定。如果當時韓國人認識到這些理論的話，理論對韓國古地圖給了什麼樣的影響呢？現在祇能知道，《晉書》的流傳使7世紀的韓國人獲取了有關知識。在此值得關注的是《晉書》之類的正史的流傳。正史的“地理志”是從《漢書》開始的。古代韓國人一直對中國書籍很有興趣，對中國書籍的輸入，尤其對歷史書籍的搜集特別的重視。古代韓國知識分子對中國歷史非常熟悉。在這樣情況下，這些歷史書籍中的有關地理的記載，即正史中的地理志是古代韓國人得到中國地理信息的重要途徑。

正史之外，地方志也流傳到韓國了。高麗王朝（918—1392）從宋朝輸入的書目中有相當多的地圖與地方志。比如，高麗宣宗八年（北宋元祐六年，1091）六月從宋朝輸入的書籍中有《括地志》五百卷、顧野王的《輿地志》三十卷、《水經》四十卷、周處的《風土記》和《十三州志》等^⑥。這些正史以及地理書的傳入，從三國時代、高麗王朝到朝鮮王朝一直被延續下來。我們雖然不能確定正史的流傳對古代韓國的地圖製作有哪些影響，但是可以推測古代韓國人對中國地理知識或製圖理論不是完全陌生的。

2. 《歷代地理指掌圖》的流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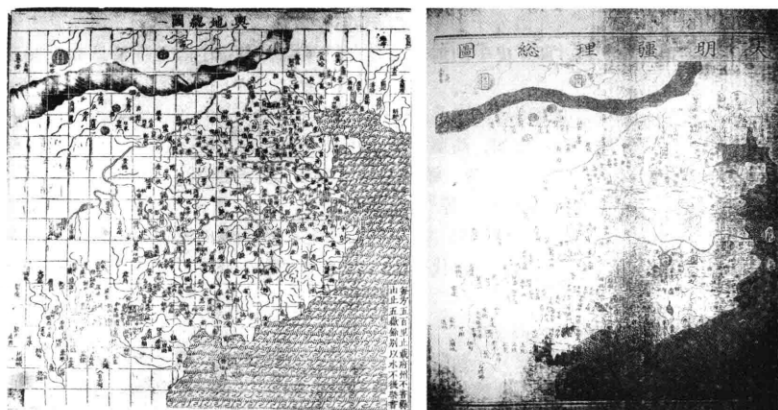
《三國遺史》^⑦卷一《紀異》“靺鞨、渤海”條，一共四次引用《指掌圖》來說明渤海、挹婁、肅慎、黑水等的位置。此間《指掌圖》應該是宋稅安禮的《歷代地理指掌圖》。《三國遺史》的“按東坡指掌圖”就是指稅安禮的地圖。可見當時人以為這本書的作者是蘇軾。據研究，起初的作者應是稅安禮，只是假託蘇軾的名字而已^⑧。

《三國遺史》與《三國史記》^⑨一樣，是研究韓國古代史的很重要的史書。但兩者特點卻不同。《三國史記》是在高麗王朝主持下編撰的，而《三國遺史》是僧一然按個人的志趣編撰的。因此，我們容易推測出編撰《三國史記》的時候，可以自由地利用高麗朝廷所藏的書籍。而僧一然撰寫《三國遺史》的時候，在利用資料方面肯定比《三國史記》有更多的限制。但高麗時代是韓國歷史上佛教最鼎盛的時期。僧侶的地位

很高。他們所具有的學識十分豐富。看僧一然的情況可以知道，他撰寫《三國遺史》的時候，不僅引用了《歷代地理指掌圖》，也引用了《通典》。可見當時知識分子可以比較隨意地接觸到有關中國地理的書。他們對中國的地理知識不會是很陌生的。這麼豐富的地理知識對製作地圖肯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現在韓國奎章閣和國立中央圖書館各藏一部《歷代地理指掌圖》，書的最後部分都有《大明疆理總圖》，可見兩本都是明以後的版本。雖然現在只有明以後的版本，不過以《三國遺史》的內容來看，高麗後期（13世紀）知識分子已經普遍使用這本書。可惜現在沒有留存的高麗時代地圖，無法知道這本書怎麼影響高麗時代的地圖。

現在留下的《歷代地理指掌圖》的版本中，最早的是在日本內閣文庫所藏的南宋版本。該版本以《聖朝升設廢置州郡圖》為最後圖。不過明以後版本就增添了元、明的地圖。奎章閣所藏的《歷代地理指掌圖》之《大明疆理總圖》的輪廓與羅洪先《廣輿圖》中《輿地總圖》幾乎一致。《廣輿圖》刊行年代被認為1555年左右，那麼奎章閣所藏本應該在其後的。在韓國的《歷代地理指掌圖》版本保留了《廣輿圖》初刊本的痕跡，表明朝鮮時代製作的地圖非常重要。現在可以發現受《廣輿圖》影響的韓國古地圖，但目前文獻上沒有任何《廣輿圖》流傳的記錄。明代版本裏出現的《廣輿圖》影響，可以說明有些韓國古地圖裏的《廣輿圖》影子絕不是偶然留下來的。



附圖1《廣輿圖》初刻本中的《輿地總圖》（左）與奎章閣所藏《歷代地理指掌圖》後附《大明疆理總圖》（右，複印本）比較

二、中國地圖對朝鮮時代天下圖的影響

留存至今的朝鮮王朝時代的地圖很豐富。由此我們可以直接發現中國古地圖的

影響。尤其直接利用中國地圖而完成的天下圖（等於現代的世界地圖）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以《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為代表的朝鮮時代天下圖，一般利用在中國取得的地圖而繪成。該圖的來源比較清楚，而且研究成果也很豐富。因此本文挑選三種朝鮮時代的天下圖，來考察中國古地圖對韓國古地圖的影響。這裏所提到的三種古地圖各代表不同的情況。第一，朝鮮本《王洋識輿地圖》顯示已經找不到原本地圖的情況。第二，崇實大學所藏《天下輿地圖》說明因原本地圖存在可以跟原本地圖比較的情況。第三，金壽弘的《天下古今大摠便覽圖》代表為了學習而製作的讀史地圖。

1. 朝鮮本《王洋識輿地圖》與中國原圖

該圖為朝鮮製作的天下圖，現在藏於法國國立博物館。本來沒有確定的圖名，有明代學者王洋所寫的識語，稱作朝鮮本《王洋識輿地圖》。地圖下方有王洋的識語與朝鮮人（姓名不詳）寫的跋文⁹⁾。通過這些文章可以清楚地知道該圖的中國原圖與製作過程。

識語：

我國家全撫方輿，一統為盛。文襄桂公有輿地圖志，念庵羅公有《廣輿圖》，而皆載在方冊，分天下為十五道。未若此圖，廣大悉備，一覽而幅員形勝，舉在目前也。吾友白君可氏得此圖於嶺表，不敢自私，而鐫梓以傳。經世者披圖按索，而疆理之宜，修攘之策，瞭然胸中，未必不為是圖為桂、羅二公志輿圖之羽翼也。吾可氏之□□，矣是圖也。具鐫兩都十三省，泊都省所隸，府一百五十有二，州二百有四十，縣一千一百有七，衛四百九十有三，所二千八百五十四，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諸司二百一十有八。都省而外，朝貢歸王，若朝鮮、安南等五十六國，遼溫河等五十八島，努爾幹、烏思藏等都司所轄二百三十八區，靡不森列，若星布雲。甲午仲夏，山陰王洋識。

跋文：

天下輿地圖一本，舊行於國中，經變之後不復見矣。近得印本輿地圖八幅，山陰王洋識之。天朝視我東，不當內服，雨露所沾，舟車所通，目不及睹，足不及履，則寫之為圖，一便覽者，誠不可一日無也。今因是圖，更考大明官制一統志，則兩京及十三省，府、縣、州、衛、所互有增減，□此略正於一。附以我國地圖，以見天朝一統之大，於今為盛也。至於日本、琉球、奴兒、忽溫之屬，並志其地。後之覽者，不可不知是圖之所始。

據地圖上的附文，在朝鮮本來有《天下輿地圖》一本，不過經過戰亂失去了。因此再得到王洋所識的印本地圖。此中國地圖為白君可刊印一共八幅組成的全國地圖。據王洋的識語，中國原圖行政區劃表現得非常詳細。從兩京十三省到外國記載得很全。此地圖的製作目的不是在於讀史等學習方面，而在於“披圖按索，而疆理之宜，修攘

之策，瞭然胸中”，則一目瞭然地看全國的行政情況。也許因此目的而需要大型全國地圖與詳細記載的地理志書。王泮所寫的甲午年應該是1594年。當時可以參照的地理書與地圖有《大明一統志》（成書於1461年）、桂萼的《皇明輿圖》（成書於1529年）又稱為《大明一統輿圖》、《楊子器跋輿地圖》（16世紀初）以及《廣輿圖》（1555年左右）等。識語中沒有提到參考了哪些書籍。朝鮮本《王泮識輿地圖》是在中國原圖的基礎上，經過與《大明一統志》一一對照而修正的。對原圖有多少的改動，不太清楚。不過，從朝鮮人跋文內容對照以外沒有提到對地圖部分的改動，可以推測除了附加朝鮮與日本之外，中國部分很可能維持原來的內容與輪廓。整體上來看，除了沒有描繪非洲與印度之外，與《大明混一圖》十分相似。在此又可以考慮該圖與《楊子器跋輿地圖》的關係。因為《楊子器跋輿地圖》是沿襲《大明混一圖》製作的，而且圖上沒有畫出非洲與印度。但是，除了地圖所反映的地理範圍之外，大陸的西南部、黃河的流向、黃河源的表現等整個地圖的風格上，朝鮮本《王泮識輿地圖》與《大明混一圖》比較接近，比《大明混一圖》更簡略，幾乎接近方形。不知道白君可的原圖如何，不過從此地圖早的《楊子器跋輿地圖》與《廣輿圖》都使用了圖例符號的事實來看，白君可的原圖使用圖例符號的可能性也比較大。地圖上記載的地名數量也遠遠超過《大明混一圖》與《楊子器跋輿地圖》。

那麼朝鮮什麼時候、為什麼製作了此地圖？首先，可以考慮“天下輿地圖一本，舊行於國中，經變之後不復見矣”一段話。可見當時朝鮮經過數次戰爭失去了以往的中國地圖，所以需要新的地圖。第二，可以考慮當時的時代背景。據學者的研究，該地圖的成圖年代是從1637到1644年之間的^⑩。當時是正好後金對朝鮮王朝用兵以後^⑪，在朝鮮朝廷內反清思想達到了高潮的時期。雖然被後金打得棄甲了，但朝鮮朝廷內部對明朝繼續使用“天朝”的名稱，一直不服於清。因此，當時朝鮮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為了重新確認朝鮮與明之間的道義而製作了此地圖。

因此，朝鮮本《王泮識輿地圖》是順應當時對中國地圖的需要與社會背景相結合繪製而成的地圖。此為常見的《大明混一圖》與《楊子器跋輿地圖》之外，16世紀中國古地圖的另外情形。

2. 《廣輿圖》對崇實大學所藏《天下輿地圖》的影響

衆所周知，《廣輿圖》是中國地圖學史上不可不提的地圖。該圖是在元代朱思本地圖的基礎上，以木刻本的形式刊印的，所以有利於普及，隨後出現了很多不同的版本和派生本。到了清後期還流行屬於《廣輿圖》系統的不同類型的地圖。這部地圖集還由衛匡國（Martinus Martini, 1614—1661）傳到西方，有助於修正馬可·波羅以來對中國的許多誤解^⑫。朝鮮積極輸入了中國書籍，尤其是地理方面的書吸引了朝鮮人的注目。《廣輿圖》一定是其中之一，不過目前還沒有發現有關記錄，因此到底什麼時候、由什麼途徑傳到韓國，尚難以知道。雖然目前還沒有找到與《廣輿圖》傳入朝鮮有關的文字記載，但有些古地圖告訴我們《廣輿圖》傳到朝鮮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第一個例子是前面所說的《歷代地理指掌圖》。

此外，現在韓國有兩種地圖代表受到《廣輿圖》影響的地圖：第一是崇實大學基

督教博物館所藏的木刻本和彩繪本《天下輿地圖》；第二是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的《天下大摠一覽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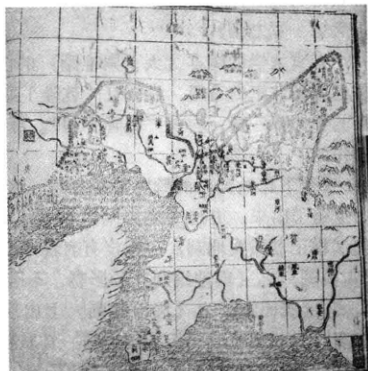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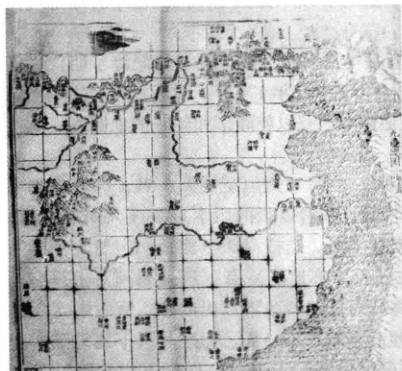
崇實大學的兩本《天下輿地圖》的內容基本上一致，在地圖上端記錄了明代從各個地方到北京的道里，最後有「乾隆丁卯孟冬」（十二年1747）。木刻本和彩繪本上題寫的年代都一樣，均為「乾隆丁卯」。可見這兩本地圖以乾隆丁卯年時的地圖為底圖而製作的。

《天下輿地圖》的輪廓基本上與《廣輿圖》中的《輿地總圖》一致，印度支那半島也繪了出來。這是《廣輿圖》初刊本的特點，萬曆以後的版本是跟《大明混一圖》或《楊子器跋輿地圖》一樣沒有表現印度支那半島。這樣《天下輿地圖》肯定受到了《廣輿圖》之《輿地總圖》的影響，不過在《天下輿地圖》有《輿地總圖》上沒有的長城。《廣輿圖》之《輿地總圖》上出現長城的是萬曆版本以後的事。清版本《輿地總圖》上的長城與《天下輿地圖》長城對照起來結果不一樣。那麼《天下輿地圖》上的長城從哪來的？答案在《廣輿圖》的《遼東邊圖》上。可見《天下輿地圖》除了《輿地總圖》以外，還參考了《廣輿圖》中別的地圖。

綜上所述，崇實大學的木刻本與彩繪本《天下輿地圖》上的文字部分與中國部分是一模一樣，但是朝鮮部分有很大的出入。彩繪本的朝鮮輪廓非常粗略，圖上祇表示了首都與八個道的名稱而已。木刻本的輪廓比彩繪本更接近於實際情況，內容也更詳細。這兩本之間的差異意味著什麼？這告訴我們《天下輿地圖》的原本地圖很可能沒有朝鮮或者很簡略地表現。《廣輿圖》之《輿地總圖》也沒有朝鮮的部分，只有國名。在中國地圖上沒有表現朝鮮或者很簡略地表現朝鮮是很常見的。那麼崇實大學的兩本《天下輿地圖》的朝鮮部分從哪來的？是否與長城一樣參考了《廣輿圖》的其他部分？不過《天下輿地圖》的朝鮮部分與《廣輿圖》中的《朝鮮地圖》有很大的差別。在此可以推測其原因。

《天下輿地圖》是在朝鮮製作的。作者覺得編輯中國部分的時候參照《廣輿圖》的其他部分是沒問題的。但對朝鮮人來說，直接利用《廣輿圖》中的《朝鮮圖》不太合適。因此，再附了另外的朝鮮地圖。不過，那個朝鮮地圖也太簡單，需要更詳細的地圖。木刻本《天下輿地圖》就是修補太過簡單的朝鮮地圖以後刻印的。製作木板地圖的時候一般在繪本地圖的基礎上雕刻。木刻本《天下輿地圖》也一樣，肯定有繪本原本。這告訴我們有可能當時還有另外版本的繪本地圖。繪本地圖是比原本地圖的朝鮮部分更詳細的。如此看來崇實大學的彩繪本《天下輿地圖》比木刻本與原本更接近，成圖年代也是更早。

兩本地圖的木刻、摹繪很精細，水平很高，不是隨便製作的。同時參照地圖上端的文字記載和地圖內容，會清楚地瞭解中國的情況。這是否與《天下輿地圖》製作目的一致？總之，《天下輿地圖》很完整地保留《廣輿圖》的輪廓。這就是朝鮮輸入《廣輿圖》的很好的證據。除此之外，在韓國還有很多有關《廣輿圖》的資料。《奎章閣圖書中國本綜合目錄》有明代陸應陽《廣輿記》、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等書，可以推測當時朝鮮人利用這些資料，製作出《廣輿圖》系列的地圖。



附圖2 《廣輿圖》之《九邊總圖》(左)與《遼東邊圖》(右)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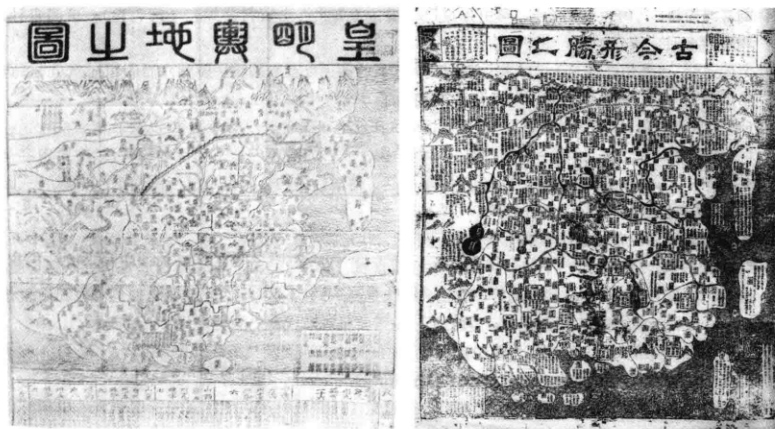
附圖3 彩繪本《天下輿地圖》局部

3. 金壽弘^④的《天下古今大總便覽圖》與中國讀史地圖

該圖是1666年朝鮮金壽弘撰繪的歷史地圖。在地圖上端引用《大明一統志》而寫了從各地到北京的道里，還引用唐杜佑《通典》而記錄了從各地到唐西京的道里。地圖的輪廓失真了，中國大陸的模樣幾乎接近方形。這可能是作者比地圖本身還重視圖上文字的結果。

在地圖上記錄文字有兩種方法：第一，在地圖符號周圍簡潔地記錄相關的政治沿革或人物事跡、名勝古跡等；第二，在地圖上下端記錄當代的行政區劃等級、管轄地區的數量、戶口、稅額等。這樣以文字記載為主而且輪廓很粗略的地圖是宋代以後地理書很重視文字記載的產物^⑤。到了 16 世紀纔開始大量出現這種地圖。具有代表性的地圖有嘉靖三十四年（1555）福建喻時的《古今形勝之圖》，還有比這地圖年代稍早的《皇明輿地之圖》^⑥。《古今形勝之圖》現藏西班牙。該圖是最早傳入西方的中國地圖。《皇明輿地之圖》由日本內閣文庫收藏，不如《古今形勝之圖》有名。兩部地圖的輪廓都屬於《大明混一圖》類型，但《皇明輿地之圖》更與原圖接近。《古今形勝之圖》與《楊子器跋輿地圖》更接近。

看來，《古今形勝之圖》之類的地圖對朝鮮金壽弘地圖有了很大的影響。金壽弘的《天下古今大摠便覽圖》是典型的圖與文字結合的、為了讀史而製作的地圖。中國大陸的輪廓與實際情況差距很大，在地圖上端有“大明一統路程記”與“唐杜佑通典路程記”給讀者提供了大量的中國地理信息，在地圖左邊引用《淮南子》說明天下的大小，還介紹了利瑪竇所傳播的西方地理知識。這些內容讓我們更確信該地圖的製作目的在於學習。雖然該圖介紹了利瑪竇的地理知識，仍然提示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沒有表現出西方國家。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作者還沒完全接受從西方傳入的地理知識。



附圖 4 《皇明輿地之圖》（左）與《古今形勝之圖》（右）比較

三、結語

從現存明清時期的古地圖來看，從《大明混一圖》開始，約過 100 年之後有《楊子器跋輿地圖》，再過幾十年產生了《廣輿圖》。《廣輿圖》與其後的《皇明全覽圖》

之間大概有 200 年左右的距離。當然中間有過無數的不同版本、派生本等。而且也有以前遺失而無法找到痕跡的地圖。比如《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上反映的元代《混一疆理圖》和《聲教廣被圖》來看可以找到連接宋和明之間古地圖的線索。《王泮識輿地圖》也顯示出從明初期的地圖到《廣輿圖》之間過渡期的情況。《天下輿地圖》是在《廣輿圖》之《輿地總圖》的基礎上與《廣輿圖》的其他部分結合，成為《廣輿圖》系統的另外一個很好的版本。

總之，韓國古地圖上的中國古地圖痕跡，對兩國古地圖學史研究非常重要。兩國地圖交流史上，中國主要在於流出、韓國主要處於接受的立場，但朝鮮人並沒有單純接受中國的地圖，加上自己特色和關心，對製作的地圖有所變化。因此朝鮮時代製作的天下圖是結合中國原圖與朝鮮地圖的特點發展而成的。

注釋：

- ① 本文中的“朝鮮”指的是大致與中國明、清同時代的韓國的朝鮮王朝（1392—1910）時代。
- ② “製圖六體”與《歷代地理指掌圖》的傳入部分多參考了汪前進的《歷史上中朝兩國地圖學交流》一文（《中國科技史料》第 15 卷，1994 年第 1 期，第 3—18 頁）。
- ③ 太宗武烈王（604—661 年），新羅第 29 代王，在位 654—661 年。名為金春秋，即位之前主要擔當外交活動，非常重視對唐外交，因此他親自多次使唐，擔任新羅對唐外交職司。
- ④ 劉喜海校錄：《海東金石苑》，轉引孫進己等編：《東北古史資料叢編》（第 3 卷），遼瀋書社，1990 年 8 月，第 634 頁。
- ⑤ 辛德勇撰：《準望釋義——兼談裴秀製圖諸體之間的關係以及所謂沈括製圖六體問題》，《九州島》第四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年，第 243 頁。
- ⑥ （韓）方東仁著：《韓國的地圖》，首爾：世宗大王紀念事業會，1975 年，第 49 頁。
- ⑦ 《三國遺史》，高麗王朝僧一然（1206—1289）撰，成書於高麗忠烈王七年（1281）。主要內容為高句麗、百濟、新羅的野史，其中包括好多神話、傳說性的內容。但是《三國遺史》中有《三國史記》沒有記載的史料，價值很高。
- ⑧ 曹婉如撰：《“歷代地理指掌圖”研究》，《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文物出版社，第 31 頁。
- ⑨ 《三國史記》，高麗仁宗二十三年（1145 年）金富軾（1075—1151）奉命撰的歷史書，以高句麗、百濟、新羅的政治興亡、變遷為重心敘述。當時是高麗的門閥貴族文化鼎盛時期，儒教和佛教相融合，高麗王朝很穩定。因此，《三國史記》是需要整理前代歷史的時代背景下編撰的。
- ⑩ 王泮識語與朝鮮人跋文的原文均轉引自（韓）《我們的古地圖及其美麗》的第 226、232 頁（韓永禹等，《我們的古地圖及其美麗》，曉炯（Hyohyung）出版社，1999 年）。
- ⑪ 對成圖年代，韓國學者與中國學者之間有不同意見。任金城與孫果清在《王泮識輿地圖朝鮮摹繪增補本初探》（《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5 年，第 115 頁）一文，把這地圖的成圖年代認為萬曆三十一年（1603）—天啟六年（1626）之間。然而，韓國的韓永禹（《我們的古地圖及其美麗》，第 230 頁）認為這地圖是在崇禎十年（1637）到崇禎末年（1644）之間製作的。韓永禹對任金城與孫果清認為出現“天朝”一詞應該是 1627 年丁卯胡亂以前製作這一主張提出不同看法，指出了朝鮮王朝直到明朝滅亡的 1644 年一直使用“天朝”這一名稱的事實（據他所說，在《朝鮮王朝實錄》也有 1627 年以後對明朝使用“天朝”一詞的例子）。除此之外，以 1637 年設置的朝鮮慈仁縣的地名來判斷，這地圖應該是 1637 年以後製作的。因此，本文站在韓永禹的立場。

- ⑫ 1627 年（丁卯）、1636 年（丙子）有兩次戰亂。韓國學術界把這兩次戰爭各叫做“丁卯胡亂”與“丙子胡亂”。
- ⑬（韓譯）Jeremy Black, *Vision of the World*, Octopus Publishing Group Ltd, 2003, p. 71.
- ⑭ 金壽弘（1601—1681），朝鮮王朝的文臣。他是丙子胡亂的時候在江華城殉節的金尚容的孫子。明清之際朝鮮的有名儒家宋史烈主張使用明的年號，金壽弘主張使用清的年號，從此可以知道他對現實政治的頭腦。
- ⑮ 李孝聰，《20 世紀以前的中國傳統輿圖》，《文化的饋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史學卷），北京大學出版社，第 255 頁。
- ⑯ 藤井讓治等編：《繪圖・地圖からみた世界像》，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附圖 11。按地圖說明，該圖是與明嘉靖十五年（1536）江西省金溪吳淉的《昊天成象之圖》一對的木刻本地圖，崇禎四年（1631）傳到日本了。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